

RCEP促区域统一市场形成 推进东亚生产网络再造

■ 姚为群

今年11月15日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20世纪70年代后,以综合商社为代表的日本跨国公司一改贸易为主要的传统,加快了对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周边近岸经济体制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形成了以日本企业为“领雁”的东亚“雁阵分工”模式。20世纪80年代初,基于沿海开放战略,中企与东亚“雁阵分工”模式融合,入世前后中国企业又凭借与日韩企业和港台厂商间的强劲生产关联融入了东亚生产网络,成为中间品的核心进口市场,中国产最终制成品销往全球各地,中企全面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之中。与此同时,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持续进步和广泛应用,资本、技术、服务和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不断提高。生产流程整合和生产环节减少的同时,提升了对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从而缩小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加工成本上的差距,吸引高智能化生产线回流发达国家。尤其是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持续蔓延,导致各经济体在关注比较优势的同时,更多考虑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因素,出现了生产要素加快向近岸集聚,产业链长度向在岸收缩的趋势,开启了全球价值链再造的进程。因此,稳定全球产业

链和供应链,提升全球价值链韧性,成为各国政府和企业的关注重点,迫切需要因势利导,为这一重大变局提供市场和制度环境保障。

以全面、现代、高质量和互惠为基本特征的RCEP,不仅仅是一个区域贸易投资安排,更重要的是为15个缔约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构建了一个开放、包容的区域性统一市场,从而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造成的世界经济衰退,为东亚生产网络的转型提供了市场空间和制度保障。可以预见,随着RCEP关税减让、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检验检疫、技术标准等统一规则落地,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效应的叠加将逐步释放RCEP的贸易创造效应,显著降低区域内贸易成本和产品价格,提升本地区产品竞争力,惠及各方企业和消费者。尤其是通过采用区域累积的原产地规则,深化了区域内产业链和价值链。就服务贸易开放水平而言,15个缔约国均作出了高于各自“10+1”自贸协定水平的开放承诺;在自然人移动方面,RCEP将承诺适用范围扩展至服务提供者以外的投资者、随行配偶及家属等协定下所有可能跨境流动的自然人类别,总体水平均基本超过各缔约国在现有自贸协定中的承诺水平;在贸易便利化措施方面,RCEP简化了海关通关手续,采取预裁定、抵达前处理、

信息技术运用等促进海关程序的高效管理手段,整体水平超过了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RCEP在世贸组织规则的基础上,加强了风险分析、审核、认证、进口检查以及紧急措施等规则的执行,推动各方在承认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中减少了不必要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并鼓励各方的标准化机构加强标准、技术法规以及合格评定程序方面的信息交流与合作。在电子商务方面,RCEP特别规定在符合公共政策目标和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的前提下,允许跨境提供在线商业服务,并通过电子方式跨境传输商业信息。在投资方面,RCEP对原“东盟‘10+1’自由贸易协定”投资规则进行了整合和升级,全面采用了全生命周期国民待遇加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方式对制造业、农业、林业、渔业、采矿业5个非服务业领域投资作出了较高水平开放承诺,明确适用投资自由化水平不可倒退的棘轮机制。

RCEP的规则为15个缔约国政府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布局,以及企业优化经营决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政策空间。在微观经济层面,RCEP为15个缔约国异质企业依据其自身比较优势,选择出口贸易实现“产地销”,或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销地产”,进入区域统一市场,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间和制

度保障。在中观经济层面,RCEP加快了15个缔约国的生产过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或服务外包,按生产环节或生产工序比较优势调整在岸与离岸、近岸与远岸的劳动分工和生产要素有效配置,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间和制度保障。在宏观经济层面,RCEP为15个缔约国可持续发展包容、互惠的开放型经济体制,通过内外两个均衡,实现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总体均衡,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间和制度保障。

展望未来,RCEP将促进东亚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融合。RCEP成员之间经济结构高度互补,域内资本要素、技术要素、劳动力要素齐全。RCEP将使缔约国间货物、服务、投资等领域市场准入进一步放宽,边境上和边境后措施逐步统一,促进域内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优化缔约国间劳动分工,拉动区域内消费市场扩容升级,推动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进一步发展。RCEP将显著提升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显著优化区域内整体营商环境,大幅降低企业利用自贸协定制度的性成本,进一步提升自贸协定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有力促进了区域协调均衡发展,为开放、包容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进程注入了新动力。(作者系中国贸促会专家委员会、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11个月,民营企业出口增长12.2%,拉高整体增速6.2个百分点。但新冠肺炎疫情还在全球蔓延,国际需求仍受制约,中国外贸企业不能掉以轻心,仍需苦练内功。

随着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在高效联通国内国际市场、激发中小微企业外贸主体活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厦门谷道集团有限公司COO李立元日前在“聚焦全球 开拓数字贸易新航线”会议上表示,在疫情形势下企业更要善用互联网开拓国际市场。“新兴或刚转型的外贸企业,缺乏外贸经验,往往出现销售渠道非常单一,订单寥寥可数,打不开市场;国内市场趋向饱和,产品打不进国际市场;同行竞争大,自己的网站、产品曝光度不够,亟需品牌的推广曝光等问题。”李立元认为,在数字外贸及倡导政策的大环境下,首先要做精准的市场定位,才能把品牌推广到全球。

如何找到适合外贸企业发展的方向、精准锁定海外市场,李立元认为其核心在于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通过分析竞争对手、布置关键词、网站与关键词相关性分析等手段,做好关键词精准布局,持续曝光,才能不断开拓目标市场,提升订单转化率,为外贸企业解决开源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加速了线上数字贸易发展,还加剧了国际销路不畅。许多外贸企业在政策支持下开始积极尝试出口转内销。

但是在渠道不熟悉、客户不了解、标准不一致的情况下,转内销也并不容易。“各个国家、地区对于中国出口商品有不同要求,国内市场也有自己的要求。”宁波市某制造型外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想要吃好“窝边草”,就必须适应国内市场规则,对产品定位进行调整。随着消费需求不断多元化、精细化,中国卖家也要转变思路,从原先提供标准化、价廉物美的产品逐渐转向提供个性化、高价值产品。“疫情之后,人们的消费观更加理性和成熟,国人对中国品牌的自信也越来越强,越来越爱用国货,这为中国品牌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该负责人表示。

当然,对于外贸企业来说,海外市场始终是重点,出口业务遭遇打击但却不能放弃。近期RCEP的签署不仅延伸和重构了区域产业链和价值链,给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经贸发展带来更多机会,让亚洲供应链的联结更加紧密。同时还提高了区域内商品的销售效率,并将进一步推动跨境电商发展。

“各方在协定中就跨境信息传输、信息存储等问题达成重要共识,对于区域内的电商交易达成了统一规则。这对于中国和区域内其他国家跨境电商都是一大利好。”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国际合作部主管杨凡欣向记者介绍,就中国的跨境电商而言,品牌化和海外目的国本土化,对于商家在区域中站稳脚跟至关重要。RCEP协议在制度上的建设,可以保证在区域内有统一的电商交易规范。她解释说,从理论上讲,中国电商企业不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工作来满足某一特定出口目的国的要求,跨境卖家进入了一个成员国就进入了整个RCEP区域。这样的大环境有利于中国电商企业在区域内的品牌化推进,也提升了电商投资效率。

杨凡欣还提到,RCEP协定之下,关税在10年期限内会逐渐减免。对于中国跨境电商企业来讲,此举一方面降低了中国电商企业成本,另一方面也能提高中国电商产品在出口目的国的竞争力。“由于关税的减免,通过跨境电商购买的商品价格比过去要降低不少,直接提高了跨境电商竞争力。”

此外,出口型跨境电商往往国际物流周期较长,中间货物流转环节较多,导致物流时效慢、运输成本高,对用户的购物体验造成负面影响。RCEP成员国之间采取或设立简化的海关程序,再加上报税政策的放宽,区域内的运输成本将会大大降低,国内出口产品的物流将更加有时效性,从而有效地解决了跨境电商物流的这大大痛点。

精确市场定位 把中国品牌推向全球

■ 本报记者 张海粟

中国国际商会 产业供应链委员会成立

■ 本报记者 谢雷鸣

12月18日,2020(首届)中国产业供应链大会暨第三届中国企业集采共享年会在北京会议中心举办。本次大会由中国国际商会指导、中国国际商会产业供应链委员会(CPCF集采供应链企业联盟、央企集采共享平台)主办、中企联信和央采传媒承办。

大会由中国国际商会综合业务部副部长洪锡国主持。商协会领导、行业专家、央企相关负责人、产业链相关环节企业代表等800余人出席了大会。

大会宣读了中国贸促会同意中国国际商会产业供应链委员会成立的批复。中铁建金服科技有限公司成为首个轮值主席单位,中国交通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上海华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中建材大宗物联有限公司为副主席单位,中企联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CPCF中央企业集采共享平台)为执行秘书长单位。

中国国际商会副秘书长张屹在致辞中说,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建立稳定、开放、安全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性,产业供应链委员会的成立既是响应党中央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的号召,也是发挥资源整合优势,践行国家“互联网+”发展战略、推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要求。

张屹对委员会的成立提出四点希望:一是发挥央企作用,保护产业供应链稳定发展;二是搭建合作平台,推动供应链数字发展;三是坚持开放合作,积极融入全球力量,委员会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更要坚持开放合作,促进国际良性合作,以开放促改革、发展;四是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会员的水平,以服务会员企业为宗旨,不断顺应国家数字化转型趋势,逐步发展为企业利益的代表平台、互利合作的资源平台、商事服务的服务平台。

该委员会执行秘书长陈祖权表示,委员会的成立是中国国际商会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的行动,委员会将以专业化服务助力会员企业优化产业供应链运营模式,带动央企供应链企业加强合作,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高产业供应链国际竞争力。

大会期间,中国铁建、中国交建、中建材、中国中铁、中国能建、中国华能、中国石化等央企产业供应链领域的相关负责人就协同发展、数字化管理、服务能力等话题作了分享。



乌兹别克斯坦日前在首都塔什干举行中国电力机车交接仪式。中国企业当日向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正式交付了4台出口的电力机车。图为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中方技术人员向乌方驾驶员展示电力机车的操作平台。

新华社发 哈利洛夫 摄

跨境电商叠加疫情 航空货运应变中转折

■ 本报记者 刘国民

“2020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航空物流市场的基本面稳中向好。从民航局公布的主要生产指标统计来看,今年货邮周转量降幅逐渐收窄。二是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为航空物流提供发展动能的同时,也提出了新要求。疫情暴发促进了‘宅经济’消费,线上购物渗透率不断提高,进一步带动了跨境电商繁荣。跨境电商市场的快速增长和支持政策的持续加码,为航空物流提供了稳定的市场预期。”在2020中国航空

物流产业年会暨2021中国需求增长与全球运力配置论坛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崔忠付说。

崔忠付分析说,从航空货运到航空物流,航空物流行业向现代物流服务商转型成为行业共识。随着电商、快递、冷链等现代物流市场高速发展,航空运输的货源结构发生明显变化。航空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运输方式,而是融入到现代物流服务体系之中。为了发挥航空运输高效率、高质量的比较优势,航空货运企业必须创新服务体系和业务模

式,整合上下游资源,由单纯的承运人角色向综合物流服务商转型。同时,货运代理企业作为航空物流的重要参与者,也同样需要向综合服务商转型。

与此同时,航空货运的发展还需要着力解决几个问题。“航空货运枢纽的发展需要便捷的地面交通、良好的通关环境、优质的地面服务、完善的航线网络、稳定的适空产业以及可用于长远规划的土地资源等多种因素的支持与协同。”崔忠付还认为,航空货运能力不足的问题是结构性失衡,是多年来“重客轻货”

的发展观念造成的。以机场设施为例,目前航空货运量主要集中在北、上、广、深等综合性枢纽型机场,导致时刻、航线、地勤服务、货站等资源十分紧张,而中西部地区的支线机场常年“吃不饱”,时刻资源却很富余。他建议通过发展货运中转业务、开展多式联运等工程,整合市场需求和有限资源,从系统及全局角度统筹规划,引导资源设施高质量供给。

在崔忠付看来,航空物流信息化发展滞后、信息孤岛现象严重、信息共享度低、货单分离等问题一直

困扰着整个航空物流链的安全、效率和效益,使得资源难以得到高效和优化配置。相较于客运而言,航空货运的互联网化水平低,客户体验差、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在与其他运输方式竞争中,航空运输的空运优势被大大抵消。但信息化建设不能一蹴而就,目标不宜定得过大过高,既要考虑不同航空公司的发展实际,也要兼顾东中西部机场的发展差距。他建议率先推进航空货运单证简化及无纸化工作,为电子化、物联网、智慧物流等工作的开展打好基础。

强化反垄断 助平台经济有序健康发展

■ 本报记者 王曼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作为明年的重点任务之一。会议指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支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时要依法规范发展,健全数字规则。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法律规范。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

“中央传达的一个重要信号是要完善数字使用规则和数据收集管

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贾晋京在中新社主办的“国是论坛”上提到,从2021年工作布局来说,健全数字使用规则是加快数字化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在完善规则的前提下,才能推进金融创新,这件事情做不好就会产生金融风险。与此同时,数字化也给经济运行带来了四个方面的核心变化,其中就包括数据资源化。

2019年中国就推动了要素市场化改革。在贾晋京看来,“十四五”规划将围绕要素市场化改革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当中一个亮点就是将数据要素作为资源。传统的要素资源如土地、劳动力等都具有稀缺性,但数据本质上不是稀

缺的。“所以‘十四五’开局之年,要健全数字规则以及相应的金融创新监管规则,如果不先建立好规则,就会把整个市场的方向带偏。”贾晋京说。

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迅速发展,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速壮大,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但与此同时,市场垄断、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的问题日益凸显,出现了限制竞争、赢家通吃、价格歧视、泄露个人隐私、损害消费者权益、风险隐患积累等一系列问题,存在监管滞后甚至监管空白。

“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企业的生产销售会规模化,规模化后会出现垄断行为,进而导致市场失灵,如果

不对垄断进行规制,会导致市场的结构性崩溃。”中国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国际经济法研究室副主任黄晋表示,反垄断法律体系是解决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反垄断是保护平台经济领域公平竞争秩序的重要抓手,是防止资本无序行为的有效制约。规范平台经济需要多措并举。

黄晋分析,作为重要的反垄断执法力量,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必将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出台规范平台领域反垄断合规和执法的相关制度,促进行业动态竞争,推动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工作,强化相关市场的公平竞争,进而保护好我国超大规模线上市场内的网络消费者。同

时可以预见的是,资本无序扩张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价值理念塑造的消极影响将受到制约,其在平台经济领域的行为将更为理性,依法依规的企业建设将更为常态化。

黄晋说,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促使商业模式进一步发生改变,平台行为、商业伦理和道德等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这也促使监管规则进一步发展和演进。

“随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强化监管已经成为发展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黄晋说,未来资本的理性行为、企业的理性行为、有序的资本竞争会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